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 主要人物简介

D143

24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科学社会主义系资料室 编

说 明

我们编写这份资料是为我系教师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提供参考。简介中介绍的四十个人，都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主要人物。简介只是着重介绍了他们的一些历史活动情况，以便大家了解这些人物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背叛无产阶级的。至于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我们已另编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言论摘录》一书供参考。

简介主要是根据苏联、英国、美国的百科全书，日本的几种人名辞典，德国和法国的若干专用辞典，以及其它有关材料编成的。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加之时间短促，因此这个简介还是比较粗糙的。希望读者在使用时注意。

这个“简介”在一九六三年曾经印行过一次，现在重印，以应教学之急。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科学社会主义系资料室

1978年9月

目 录

伯恩施坦.....	1
考茨基.....	4
普列汉诺夫.....	11
奥艾尔.....	14
福尔马尔.....	15
列 金.....	16
库诺夫.....	17
哈阿兹.....	17
大 卫.....	18
谢德曼.....	19
诺斯克.....	20
艾伯特.....	21
休特古姆.....	21
连 奇.....	21
希法亭.....	22
盖 得.....	23
米勒兰.....	24
饶勒斯.....	25
桑 巴.....	27
爱尔威.....	28
龙 格.....	28
茹 奥.....	29

维·阿德勒.....	29
伦 纳.....	30
弗·阿德勒.....	31
鲍威尔.....	32
安塞尔.....	33
王德威尔得.....	33
胡斯曼.....	35
比索拉提.....	36
屠拉梯.....	37
海德门.....	37
韩德逊.....	39
麦克唐纳.....	40
龚帕斯.....	41
万-科尔	42
特鲁尔斯特拉.....	43
布兰亭.....	44
伯格别尔格.....	45
格里姆.....	45

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年)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首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最大代表之一。1850年1月6日生于德国柏林。他的父亲原来是行会中受过训练的白铁匠，后来做了火车司机。他的双亲都是犹太族的血统，并且都是犹太新教的信徒。伯恩斯坦的叔父阿隆·伯恩斯坦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机关报《柏林国民报》的创刊人和多年的社论撰稿人。伯恩斯坦最初进的是一所七年制的私立学校，毕业之后，进入一所九年制完全中学，读到六年级就停学了。1866年去古滕塔克兄弟银行做学徒，学徒四年期满后，即到魏玛一家银行在柏林的分行作书记。这个工作没作多久，1871年夏天转到 S.&L 路特希尔德银行担任同样的职务，在这里工作了七年之久。

伯恩斯坦于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但他并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在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合并之前，伯恩斯坦主张与机会主义的拉萨尔派妥协；后来他又成为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

1878年夏天辞去了银行中的职务，去担任德国改良主义者赫希柏格的文学秘书。这时，他们从德国迁居瑞士。赫希柏格在苏黎世出版了《社会科学年鉴》，在莱比锡出版了《政治经济文丛》。伯恩斯坦在这两种刊物上开始写作，并担任了《年鉴》报道部分的编辑。1879年伯恩斯坦和赫希柏格、施拉姆在

《年鉴》上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宣传改良主义，遭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判。

1880年，考茨基也应赫希柏格的邀请到了苏黎世。考茨基与伯恩斯坦来往甚密，已经是臭味相投了。

在1880年和1881年之交，伯恩斯坦担任党的秘密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之后，在恩格斯的监督下，为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贯彻革命路线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伯恩斯坦没有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1888年该报迁移到伦敦后，他又醉心于英国费边社的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在以后的活动中，越来越暴露出他企图摆脱恩格斯的约束，摆脱恩格斯对他的影响。恩格斯非常注意伯恩斯坦的种种行为。关于伯恩斯坦，恩格斯在晚年曾这样写道：“他仍然没有做到他所应该做到的那个样子。他现在热中于琐碎的问题，而且越来越像他那位在《国民报》工作的英明的叔父了。”（转引自《恩格斯传》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1页）

果然不错，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的态度就日益嚣张起来，他和福尔马尔、奥艾尔等机会主义领袖结成一伙，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进攻。从1896年起，他写了一系列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发表。在《新时代》1897至1898年第1册上发表了《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臭名昭著的公式，遭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谴责，并要把他开除出党。但是在1898年10月的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上，他仍然被留在党内，他并且向党代表大会写了一封信，公然为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辩解。1899年1月，他根据这封信的观点写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这本书集当时修正主义“理论”

之大成，以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成为社会民主党右派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列宁称之为“叛卖变节的作品”。1899年10月汉诺威党代表大会召开时，讨论了这本书，最后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决议，反对伯恩施坦的观点。伯恩施坦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他只从英国来到紧挨着德国边境的荷兰小城欧尔登萨尔。因为他当时是党的秘密机关报的编辑，德国政府要逮捕他。1901年2月返回德国。返国前，他在国外居住了二十二年。

1900年4月，伯恩施坦退出《新时代》经常撰稿人集团（《新时代》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由考茨基主编），同时成为《社会主义月刊》（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的机关刊物）的经常撰稿人，直到1914年底，在该刊物上继续进行修正主义的宣传。

1901年在吕柏克召开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伯恩施坦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指责伯恩施坦的决议，但是伯恩施坦声明说，任何大会决议都不能使他对自已的信念感到迷惑。

从1902年起，伯恩施坦成为德国帝国议会的议员，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成员之一。他选择捐税政策和贸易政策作为议会活动的工作范围。1914年8月在德国帝国议会中，投票赞成威廉第二政府的军事拨款。伯恩施坦无耻地把这种背叛行为说成是“德国人民的代表也就这样向敌国显示出一条统一战线”。伯恩施坦完完全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列宁称这种露骨的沙文主义为“社会帝国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1917年4月伯恩施坦参加了考茨基、哈阿兹等“中派”分子组织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9年伯恩施坦退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

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后，他反对十月革命，仇视苏维埃政权。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他积极进行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和修正主义的理论活动。1918年末和1919年初任德国资产阶级政府国家金库（财政部）的助理，但他的主要活动是参加内阁核心的重大会议、部长和各部门领导之间的不公开讨论。1920年成为共和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参加捐税委员会和捐税立法会议。1921年在柏林大学开设《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的争论问题》的特邀讲座。1921年写成关于德国革命的著作的第一卷《德意志共和国的产生和最初的活动时期的历史》。1923年还写了一篇《为什么能够和将怎样实现社会主义？》伯恩施坦坚持反革命活动直到死去。

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年)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首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理论家”。1854年10月16日生于布拉格，9岁时全家迁往维也纳。他是捷克人和德国人的混血儿，父亲是捷克人，舞台背景画家，母亲是德国人，演员和小说家。

1871年，考茨基在巴黎公社的影响下，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1874年开始研究社会主义，阅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文献和拉萨尔的著作。同年秋天，考入维也纳大学哲学系。

1875年1月，在维也纳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来又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年，发表了他的第一本著作《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1876年结识了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并向德、奥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投稿。

1880年，应卡尔·赫希伯格的聘请，当了他的出版事业的助手，迁到苏黎世。在苏黎世，他认识了当时作为赫希伯格秘书的爱德华·伯恩施坦，逐渐同他成为“莫逆之交”。同年，

考茨基发表了他的另一本著作《人口增加对社会进步的影响》。这时，考茨基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哲学观点是折衷主义，政治观点是拉萨尔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混合体。

1881年开始与恩格斯通信，3月到了伦敦，7月重回苏黎世。在伦敦期间，认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在他的《土地问题》一书的序言中说：“在我的……活动的初期，我完全不同情马克思主义。我对马克思主义也是抱着批判的和不相信的态度，就像现在那些高傲的、瞧不起我那种教条主义狂热的人一样。只是在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我才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转引自《列宁全集》第4卷第64—65页注）但实际上，他从来也不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指出考茨基的一些弱点。马克思在第一次见到考茨基时，就对他下过这样的评语：“他是个平凡而无远见的人，很自负（他才26岁），自信什么都懂，相当勤勉，曾经花了很多时间搞统计学，但收效不大；是个天生的俗种。”（转引自《恩格斯传》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7页）。恩格斯也指出，考茨基“……是一个纯粹的学院和经院哲学家，他不但不能把复杂的问题弄清，反而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转引自同上书第221页）

1882年，因赫希伯格破产，他辞去了工作，回到维也纳。同年秋天，开始筹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

1883年1月，《新时代》在斯图加特创刊。因当时德国处于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时期，杂志起初是以考茨基和出版者泰斯的个人名义出版的（1885年—1888年该杂志在伦敦出版，1890年又迁回斯图加特）。直到1917年为止，考茨基一直是这个杂

志的编辑。

1885年11月到伦敦，在那里编辑《新时代》，并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利用大英博物馆进行科学研究，此后陆续写出了一些通俗说明马克思主义个别方面的书和小册子，如《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年）、《土地问题》（1899年）等。这些书尽管有些错误，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1888年离开伦敦，在维也纳住了一年。1889年着手编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

1891年，在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废除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了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考茨基是爱尔福特纲领的起草人之一。在这个纲领中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1892年他写了《爱尔福特纲领原则部分说明》一书，从理论上解释了这个纲领，但也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一股修正主义的逆流。从1896年起，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不加评论就连续发表了伯恩斯坦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论文（《社会主义问题》）。考茨基在他的《自传》中写道：“从一八九六年秋天起，伯恩斯坦在他的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开始对我们的各个传统观点进行批判，当时我对此也抱有极大的同感，把它看作是我和恩格斯已经开始做的事情的继续。”（译自〔日〕《世界大思想家全集》第14卷第290页）1898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他在为对修正主义的妥协态度辩解时说：“伯恩斯坦没有使我们丧失信心，而是使得我们思考。为这一点我们应该感谢他。”

（普列汉诺夫：《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一文注，《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

1899年，当伯恩施坦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时，他不得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同年出版了他写的《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书，但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的批判是极不彻底的，他只是着重从经济方面批判修正主义，而故意避开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他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5卷第465页）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考茨基曾公开承认：“我起来反对伯恩施坦是极端勉强的，而且常常只是被迫的。”（转引自《二十世纪初德国工人运动的高涨》〔1903—1906〕莫斯科俄文版第102页）

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讨论了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在这里，考茨基又一次表现出他的动摇和失节行为。他站在“中派”的立场上，起草了一个实际上是向机会主义投降的“橡皮性”决议。

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他竭力避免针锋相对的争论，主张“和和气气地”同修正主义者商量。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斗争的问题上，考茨基是一贯站在孟什维克方面的。

1909年，考茨基发表了《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在这本书中，像在他的其它一些著作中一样，“既没有提到‘打碎’军事官僚国家机器，更没有提到用巴黎公社形式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关代替议会机关和官僚的问题。”（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8年俄文版第135页）

1910年，考茨基同希法亭、鲍威尔等人组织了“中派”，这是一群带假面具的机会主义集团。列宁指出：“‘中派’是被腐败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等等环境败坏了的顽固

派，是慣于找个安乐窩和‘穩当的’工作的官僚。”（《列宁全集》第24卷第54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考茨基墮落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中派’的主要领袖和代表卡尔·考茨基，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中最有威望的人物，是彻底毁坏马克思主义、毫无气节、从1914年8月起就非常可鄙地动摇和叛变的典型。”（同上）

1914年8月4日，当德国国会表决军事预算时，考茨基弃权，实际上是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站在一起，拥护本国资产阶级的掠夺战争。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并写了《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等小册子，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竭力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企图用“超帝国主义”的谬论和歌颂和平的靡靡之音，来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从而为帝国主义效劳。

在革命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他同哈阿兹和其它“中派”分子一起，为了控制革命运动，并阻止左派形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于1917年4月在哥达建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在本质上是一个投机的党，列宁曾无情地揭露过考茨基及其同伙的这种欺骗行为。

在战争期间，考茨基同伯恩斯坦成了更加亲密的难兄难弟。他在《自传》（1923年）中写道：“当时，我同伯恩斯坦进行了最密切的接触，我们在战争时期又合作起来了。尽管还各自保持着理论上的特点，但在实际行动方面我们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而且直到今天仍是如此。”（译自〔日〕《世界大思想家全集》14卷第296页。）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考茨基更墮落成为反对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凶恶的敌人。自1918年起，他

写了一系列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1918年，考茨基以“纯粹民主”的卫护者的姿态，发表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反动透顶的小册子，极力颂扬资产阶级民主，毁谤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伟大的十月革命。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对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指出：

“考茨基史无前例地歪曲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说，考茨基本人已经堕落到自由主义者的地步，因为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鄙地吹嘘‘纯粹民主’，掩饰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内容，最害怕被压迫阶级使用革命暴力。既然考茨基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的‘解释’，是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使用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是在用自由主义来曲解马克思这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叛徒伯恩斯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较起来，简直是个后生小辈了。”（《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3—224页）此后，考茨基更变本加厉地攻击布尔什维克，攻击苏维埃制度，他继续写了《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19年）、《从民主制到国家奴隶制》（1921年）、《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1922年）、《处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1930年）等等。考茨基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实际上是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续篇，他在谈到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时，声称要“讨论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维克方法的态度”，妄图使这本书成为“声讨”布尔什维克“罪行”的“檄文”，以此攻击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9月，列宁在《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一文中无情地揭露了考茨基直接为资产阶级效劳的真面目。

考茨基不止是在理论上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公开地进行颠复活动，他曾亲自出马到格鲁吉亚去支持孟什维克反对苏维埃政权。

在1918年德国十一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考茨基反对工兵代表苏维埃变为政权机关，他主张苏维埃与立宪会议“合并”。这是一条使苏维埃服从资产阶级，准备消灭苏维埃的路线。因为考茨基对资产阶级有功，他被任命为艾伯特—谢德曼反革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在考茨基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竭力阻碍德国与苏维埃国家恢复联系。为了粉饰德帝国主义，开脱它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状，考茨基伪造了一部《德国关于战争爆发的文件》（四卷本），于1919年开始在柏林陆续出版。

1927年，考茨基写了《唯物史观》一书，这本书集合了他的全部反马克思主义叛徒式的反革命观点。

1930年，考茨基肆无忌惮地主张公开发动反苏武装干涉，号召支持帝国主义在苏联境内煽动起来的反苏行动。在希特勒独裁政权建立的年代里，考茨基加紧进行分裂工人阶级的反动活动。1933年，德国法西斯政变以后，考茨基迁居维也纳。1938年，当德国军队进入奥地利时，他逃亡捷克，但纳粹分子拘禁了他的两个儿子。不久，他又逃到荷兰。1938年10月17日，死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考茨基的一生是堕落为修正主义者的一个典型例子。尽管他曾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背得烂熟，但由于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劣根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因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和分水岭。考茨基在这个问题上从来也没有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他在国家问题上是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的。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这个根本问题不容他躲避的时候，他就堕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公开敌人了。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指出：“为什

么把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很熟的考茨基竟这样荒谬绝伦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呢？从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考茨基是要这套把戏的大师。从实际政治来看，这是为机会主义者效劳，归根到底就是为资产阶级效劳。大战开始以后，考茨基更是加速地精通了这种艺术，口头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奴才。”（《列宁全集》第28卷第216页）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 1856—1918年)

俄国孟什维克首领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首领之一。于1856年12月11日（即俄历11月29日）诞生在唐波夫省利彼茨克县古达洛夫卡村的一个小地主家庭里。他的父亲瓦连廷·彼得罗维奇·普列汉诺夫是一个小贵族。他的母亲马丽亚·费多罗夫娜（别林斯基的亲戚）是一个具有先进思想的人，对自己的儿子影响很大。1866—1872年，普列汉诺夫在沃龙涅什陆军中学学习，毕业后，1873年进入康斯坦丁诺夫军官学校学习，1874年秋又转入彼得堡矿业学院学习。

普列汉诺夫的全部活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875—1883年是民粹主义者；1883—1903年是马克思主义者；1903年以后转向孟什维克，最终堕落成了机会主义、沙文主义者，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普列汉诺夫在大学时代，即在1875年便和民粹主义者、彼得堡的工人建立了联系，并参加了革命活动，因此便于1876年被迫辍学离开了矿业学院，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1876年他参加了民粹派的“叛逆者”小组（这个组织后来并入民粹派的“土地与自由”组织）。这一年12月6日，他积极地组织并参加了在彼得堡卡赞教堂广场上举行的政治示威，发表了反对专制

制度的演说。从这时起普列汉诺夫就处于秘密状态中，他工作的地方彼得堡公共图书馆（即今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图书馆），成了他的避难所。这时普列汉诺夫不仅是民粹派的革命活动家，而且是一个民粹主义理论家。作为民粹派的宣传家，积极参加了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他曾两次“到民间去”筹划起义，相信通过农民革命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时，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他也非常关心“工人事业”。他领导工人小组，出席工人集会，帮助组织罢工，在《土地与自由》杂志上发表文章和通讯，撰写有关工潮和罢工的传单和小册子，号召工人参加斗争。1878年便成了民粹派的机关报《土地与自由》的编辑。民粹派在1879年“土地与自由”组织的沃龙涅什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分裂为“民意党”和“黑分党”（即“土地平分社”），普列汉诺夫成为“黑分党”的首领。

普列汉诺夫曾因革命活动而两次（1877年和1878年）被捕。为了躲避沙皇政府的追捕，他于1880年1月15日流亡国外，侨居瑞士日内瓦，在此一直度过了三十七年的流亡生活。在国外，他同盖德、考茨基、威·李卜克内西、伯恩施坦以及当时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导人建立了个人的联系，并在80年代末结识了恩格斯。从1880年起，普列汉诺夫开始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文献，到1883年，便抛弃了民粹主义思想，而变成了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

1883—1903年，普列汉诺夫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1883年，普列汉诺夫同过去“黑分党”的其他成员（查苏利奇、德依奇、阿克雪里罗得等）一起，在日内瓦创建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很多工作。1889年7月普列汉诺夫和拉甫洛夫、贝克、克朗茨、包尔斯基、弥勃组成俄国代表团出席了第二国际的成

立大会，即巴黎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许多年间他在第二国际的执行局中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曾积极地参加了德国、瑞士、法国、意大利的社会党的政治活动，以及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和执行局的工作。在1883—1903年这个时期内，普列汉诺夫写出了一系列反对民粹派、“经济派”和反对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优秀作品，他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年）、《我们的意见分歧》（1884年）、《论一元历史观的发展》（1885年）等书，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他所用过笔名有：恩·倍尔托夫、恩·卡曼斯基、阿·基尔山诺夫，等等。在1900年到1903年，普列汉诺夫同列宁一起领导了《火星报》和《曙光》杂志。但在此期间，普列汉诺夫同列宁几次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

1883—1903年是普列汉诺夫一生中的重要时期，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期，但在这一时期他的著作（包括1902年他起草的党纲草案在内）中，就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错误，如对农民的革命性估计不足；坚持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的路线；漠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点——无产阶级专政等，这些错误就是他后来孟什维克观点的萌芽。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是与列宁站在一起的，虽然当时也有过一些动摇。但在大会以后，他为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吓得惊慌失措，于是决定同孟什维克妥协，转到孟什维克阵营里去了，变成了孟什维主义的首脑。从1903年末起，普列汉诺夫便开始顽固地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在俄国1905年革命时期，普列汉诺夫责难1905年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他公然对党进行攻击，说“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

在1908—1912年斯托雷平反动年代，普列汉诺夫在孟什维